

國家社稷存亡之道德： 春秋、戰國早期「忠」和「忠信」概念之意義

佐藤將之*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

摘 要

本文的目的在於釐清「忠」和其複合詞「忠信」概念的內涵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中的演變及其思想史上的意義。一般而言，過去對中國古代「忠」概念的研究大體上都認為，戰國時期所進行的君主集權和官僚制度的形成，促成原來「真心」義的「忠」字變成「為君效勞」義的「忠」字之變遷。反之，本文經過《國語》和《春秋左傳》、中山王陵彝器銘文、以及新出土的「郭店楚簡」〈忠信之道〉和〈魯穆公問子思〉中的「忠」和「忠信」用例之分析，乃試圖論證，春秋到戰國的社會變化和新的國家與社會秩序之形成，應該首先促進了認同社稷之主張，因而從春秋到戰國早期之「忠」和「忠信」之意涵原來就與政治意義息息相關。也就是說，「忠」概念之核心意涵乃係能貢獻國家社稷的繁榮和安寧之行爲，以及其實踐者的「誠懇」之心態。

關鍵詞：「忠」，「忠信」，中山王陵彝器銘文，〈忠信之道〉，〈魯穆公問子思〉，《國語》，《春秋左傳》

序 言

長久以來，「忠」概念在東亞倫理思想中，係指君臣關係最關鍵的價值概念之一，尤其以「忠臣」、「忠義」等複合詞代表對主上的忠誠。同時，也如「忠臣孝子」一般，「忠」常常與「孝」概念連結，表示在中國社會當中，政治、社會上的

* 本文作者電子郵件信箱：msato@ntu.edu.tw。

下屬服從其權威之重要。不過，由近代以來的思想史研究對於古代「忠」概念的分析當中早已發現，「忠」和「孝」並稱直到戰國末年之前尚未普遍。而且從春秋到戰國時代的用例當中，「忠」字反而常與「信」字結合。在這樣的用例中，「忠」字純粹係指「臣對君的忠誠」之意涵實屬少數。相反地，在戰國早中期的用例當中，「忠」和「忠信」竟然指「君對人民」的一種誠心。因此引發吾人必然地追問：原來也包含「君對人民」的「誠心」之意涵，為何變成「臣對君」的「忠誠」意？

然而，從 1974 年到 1978 年從河北省平山縣三汲之中山王陵出土的方壺和圓鼎中的銘文，以及 1993 年從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村之楚墓出土的竹簡，即「郭店楚簡」均包含「忠」和「忠信」之重要用例。由於此兩大考古發現，「忠」和「忠信」概念的研究也進入了新的階段。中山王陵彝器銘文的內容可以代表公元前四世紀後半——即戰國時代早中期——的「忠」和「忠信」觀念之用例。關於郭店楚簡，我們不需要贅言其對戰國早中期思想重構之重要意義，在這裡只是指出，郭店楚簡除了本身包含著相當豐富的「忠」字用例之外，還包含著專論「忠臣」之〈魯穆公問子思〉一篇和闡述作為「君對人民之誠心」意涵之「忠信」的〈忠信之道〉一篇。

再者，在我們能確認中山王陵和郭店楚簡的用例之思想內容能代表戰國早中期的思想之基礎上，進一步將此與在過去研究中比較被忽略的傳世文獻中的用例相比較的話，便能夠發現過去關於「忠」和「忠信」觀念之研究並沒有妥善釐清幾個重要思想事實。基於這樣的觀點，本文將仔細地分析《春秋左傳》和《國語》中「忠」和「忠信」的用例。經過對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的用例中之比較分析，本文將試圖論證從春秋到戰國早期的政治思想中，「忠」和「忠信」應為當時最關鍵的幾個價值概念之一，尤其到戰國早期，其重要性甚至可能比「仁」或「仁義」還重要。正如本文題目所提示，春秋到戰國早期的知識份子深信，缺乏「忠信」的國家無法生存。也就是說，本文試圖闡明「忠」和「忠信」概念在春秋到戰國初中期政治思想中的獨特且關鍵性的政治價值功能。（註 1）

1. 一些學者或許主張：因為《國語》、《左傳》等文獻的最後編輯可能拉晚到秦漢時期，這些文獻中的思想也可能無法正確反應春秋到戰國早中期之思想。其實，筆者之所以強調可以斷定絕對年代的中山王陵銘文之意義也在這裡。在某些傳世文獻當中，若有與此銘文的思想一致的部分，它很有可能可以代表戰國早中期的思想特色。

一、過去研究對「忠」和「忠信」的看法

雖然如上所述，在「忠」和「忠信」概念的研究當中，中山王陵方壺、圓鼎的銘文和郭店楚簡的出土可說是其研究的分水嶺，不過這並不意味著於此兩項資料出現之前的研究都是過時的；吾人反而發現，與本文所討論的相關議題之重要見解其實早在過去的研究中就被提出。尤其在二十世紀中期從比較哲學的方法逐漸轉為以思想史研究方法之日本學界中，幾位著名學者開始專門討論了「忠」概念在中國古代思想中的特質。下面，我們評述過去專門研究此題目的六篇重要論文之主要觀點。筆者將此六篇按照其討論範圍分為三種：

- (1)在中山王陵銘文和郭店楚簡出土之前的研究，即高田眞治先生（1944）和濱口富士雄先生（1972）的研究。
- (2)引進郭店楚簡的思想分析的研究之李承律先生（1999）、湯淺邦弘先生（2001），以及黃君良先生的研究（2003）。
- (3)將郭店楚簡和中山陵銘文之內容考慮進去的城山陽宣先生之研究（2005）。

中山王陵的出土早於郭店楚簡，但李承律先生、^(註2)湯淺邦弘先生、黃君良先生三位之論文中都沒有論及中山王陵銘文的內容，相形之下，城山先生的文章則不僅將中山王陵銘文的內容當作其考察之核心，而且也參考除黃君良先生之外的全部上列研究，因此筆者將本項放在最後討論。^(註3)

(1) 中山王陵銘文、郭店楚簡出土以前的研究：

首先來看高田眞治先生的〈先秦思想中的「忠」〉的觀點。^(註4)高田先生在當代學者當中，應該是第一個專門提出「忠」概念的原意並非「對君上的忠誠」，而是更廣闊的「真心無妄」之意的問題，並且試圖闡述為何此原義變成主要涵蓋「臣道」的概念之學者。高田先生的觀點可以歸納於如下五點：(1)「忠」字的原意係

2. 李承律先生的論文（後詳述）提及中山王陵銘文中有「忠」和「忠信」的用例之事實，但未加以分析。
3. 王子今，《“忠”觀念研究——一種政治道德的文化源流與歷史演變》（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9年）仔細分析《左傳》和《國語》中的「忠」字用例之後，指出「忠」字於晉國相關記述中最常出現的事實。
4. 此文收入於高田眞治，《東洋思潮の研究》（東京：春秋社，1944年）。

「真心」。尤其他認為「盡真心」就是在《論語》中的「忠」字的本意；(2)在《左傳》中一些「忠」字的意思反而係「君對人民盡誠」之意；(3)「忠」概念從「君對民」的意涵變成「臣對君」之意的變化與當時國家觀念的形成息息相關；(4)作為「臣道」的「忠」在《荀子》思想中可以看到其完成的論述；以及(5)在《中庸》裡，「忠」概念似乎與「誠」、「禮」、「樂」、「孝」等其他概念一樣都歸於天道。

接著來看濱口富士雄先生在 1972 年發表的〈荀子之忠〉一文。^(註 5)濱口先生首先整理高田眞治、小糸夏次郎、津田左右吉、宇野精一等學者的看法：即，春秋時代到戰國早期的「忠」係指廣義之「真心」，而到了戰國時代的國家意識型態形成之時，成為逐步受到重視之觀念。不過，濱口先生指出，君臣關係的重要性其實從孟子以前就受到重視，而且原來「義」字就代表規定君臣關係之倫理德目。據此，他進一步試問，為什麼戰國時代的思想家還要特別將原來係指廣義之「真心」的「忠」字來代表「臣道」的德目，以替代「義」觀念？根據這樣的問題意識，濱口先生試圖在《荀子》「忠」字的用例中，找出其解答的線索。他發現，《荀子》使用「忠信」一詞時，此「忠信」往往意旨「在上」的人對「在下」的人之「誠心」。相對地，「忠」字單獨出現的時候，絕大多數之用例則是在討論「君臣關係」的脈絡下出現，不過這樣的用法集中於〈臣道〉，而在其他篇章幾乎沒有看到。到此，濱口先生強調，到戰國時代，宗族身分制度解體，一方面商人等非貴族階級崛起，另一方面國主也將國內的政治權力集中於自己的手中。在此，將國主和人民直接連起來的「官僚體制」之原型乃產生。在此歷史脈絡中，原來係「誠心意之「忠」，逐漸包含對某些職位之責任意識的「忠」，進而變成對主上的「忠誠」之意。同時，他也探討，在春秋時代已經有規定君臣之間德目之「義」，為什麼還要用「忠」概念來重新規定「君臣關係」的倫理之問題。濱口先生認為，「義」字是在世襲貴族的勢力還強大的時候之倫理德目，因為國主和貴族之間原有基於血緣關係的「禮」之規範，所以只要有「義」就可以涵蓋君臣之間的道德。不過到了戰國時代，在官僚制度形成的過程當中，君臣關係漸漸變成一種職能關係，在此光靠「義」概念無法規定此職權關係的倫理。如此，「忠」字「對某個職位之責任」之意涵受到重視。

5. 此文收於《大東文化大學漢學會誌》，12 號（1972 年）。

(2) 包含郭店楚簡思想之研究：

下面來看在郭店楚簡出土之後所發表的有關「忠」和「忠信」的研究。郭店楚簡出土以後，在「忠」字的分析當中，具有最豐富的用例的文獻有〈魯穆公問子思〉和〈忠信之道〉兩篇。不用說，在對其兩篇文獻性格與隸定難字的研究之基礎上，^(註6)一些學者探討此兩篇的「忠」概念在先秦「忠」概念演變過程中的思想意義，而下面所要評述的是李承律、湯淺邦弘、以及黃君良三位的研究。

首先我們看在郭店楚簡公布之後不久就出版的李承律先生的〈郭店楚簡『魯穆公問子思』の忠臣觀について〉一篇。^(註7)本文的前提是，「到《荀子》，加以作為『臣道』的『忠』之『忠臣』一詞在思想上才開始出現，而之後普遍被使用……」。^(註8)李先生分析《荀子·臣道》的「大忠」、「次忠」、「下忠」的概念，而指出，與〈魯穆公問子思〉的「恆稱其君之惡」的忠臣比較接近的是「以是諫非而怒之」的「下忠」。如高田、濱口一樣，李先生也重視歷史背景。他說，「忠臣」一詞在從「宗族制」到「家父長制」、從重視「個人倫理」到重視「國家倫理」、從道德主義到官僚制賢賢主義的歷史脈絡中出現的現象。不過，李先生卻觀察到〈魯穆公問子思〉將「爵祿」和「義」看做相衝突的二元，而主張取後者。由於〈魯穆公問子思〉的「臣下要服從道德的義務，而主上也需要尊重這樣的臣下」之主張，與《孟子》和《墨子·耕柱》的主張類似，因此，李先生結論說：「〈魯穆公問子思〉的思想乃代表戰國末年之前，也就是比理想重視現實的時期之間的思想，即孟子之後，荀子之前。」

6. 請參考周鳳五，〈郭店楚簡《忠信之道》考釋〉，收於《中國文字》，期二十四（1998年）；李存山，〈讀楚簡《忠信之道》及其他〉，收於《中國哲學》，輯二十（1999年）；黃人二，〈郭店楚簡《魯穆公問子思》考釋〉，收於《張以仁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上冊（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9年）；以及麥笛（Dirk Meyer）：“A Device for Conveying Mean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Guodian Tomb One Manuscript ‘Zhong xin zhi dao’”，*Bochumber Jahrbuch zur Ostasienforschung* [東方學年刊]，vol. 29 (2005) 等研究。
7. 李承律先生的觀點忠實遵守其師池田知久先生的立場：即郭店楚簡的思想不會早於戰國末年。本文原來刊載於東京大學楚簡研究會編，《郭店楚簡的思想史的研究》，卷1（東京：東京大學楚簡研究會，1999年），後來轉收於池田知久編，《郭店楚簡儒教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3）。
8. 原文是「ここで始めて臣道としての『忠臣』ということばが、思想史上に登場する。」然而，《慎子佚文》中有〈知忠〉，而這一篇具有「忠臣」一詞，也是有關「忠臣」之專論。因此，除非有積極的理由斷定此篇是偽作，並不能說荀子之前並沒有有關「臣道」之廣闊之辯論。我認為是相反。因為荀子之前已經有像慎到那樣非常尖銳的「君臣關係論」，荀子也隨之不得不提出他自己的「臣道」論。如此推測比較合理。